

入祀宁海州乡贤祠、忠孝祠的先贤们

□曲延科

清顺治初年，朝廷敕令：省府州县于学宫内建名宦、乡贤二祠。宁海州府于是在学宫内文庙大成门东侧建起名宦祠，在西侧建起乡贤祠。雍正2年(1724)，再下敕令：省府州县于学宫内建忠义孝弟(悌)祠(简称忠孝祠)，州府又在名宦祠之东建起6间忠孝祠，其中“忠义”“孝弟(悌)”各三间。乡贤祠、名宦祠和忠孝祠旨在“显忠良、仰承德、维风教”，化民导俗，因此所祀者都是些有功德于一方，居乡为乡贤、居官为名宦、忠义为楷模之人。作者已在《了却百姓事赢得身后名》(见《烟台日报》6月2日)一文中介绍过祀入宁海州名宦祠的精英，本文重点介绍宁海州的乡贤祠和忠义祠所祭祀的先贤。

祀入乡贤祠的先贤

生于本地且有德业者谓之乡贤。祭祀于宁海州乡贤祠的乡贤共有9人，其中后汉1人，为刘宪；明代4人，为赵仁、俞价、常康、王日新；清代4人，为李初妍、杨维乔、李挺生、曲圣凝。

刘宪为后汉名臣，为历代士子之楷模，但却不是牟平人。在汉代，现今的福山称为牟平，而现今的牟平称作东牟。明嘉靖2年(1523)，宁海州同知焦希程纂修《宁海州志》时，误把刘宪当作牟平人，此后以讹传讹，近200年来，世人一直把刘宪当作牟平人。直至1932年于清洋主纂民国版《牟平县志》时，通过多方考证，才把这一错误纠正过来。

宁海州乡贤祠所祭祀的明代4位先贤都是当代鼎鼎有名的官宦。这里着重说一下俞价。

俞价是城南门里人，明万历己丑(1589年)进士。乙未年(1595)，由行人改为吏部，其认为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吏部，对任命坚辞不受，最终改授监察院河南道监察御史。俞价是明代有名的诤臣，人称“黑包公”。

俞价倨傲严正，忠直敢谏。初到任时，很被皇帝看重，在关边、钱谷、盐屯、守令、人才、崇贤纳才等方面的疏言，都得到皇上的肯定，一一准奏。其又秉正嫉恶，刚直不阿。弹劾诚意伯刘延世“上蔑天意，下吸民脂，目无法纪，贪赃自肥”，使刘延世伏法；参政丁此吕贪污受贿，左都御史孙丕扬上奏弹劾。权臣江东之、沈思孝与丁此吕交情甚厚，上疏为丁此吕辩解。俞价怒甚，即上书劾江、沈二臣，此举令孙丕扬“惊壮之”。最终丁此吕受到惩处，江、沈落败。自此，京中权贵对俞价侧目，一边互相告诫“勿挠(触犯)俞御史法”，一边罗织罪名，对俞价栽赃陷害，幸有皇帝保护，方幸免于难。

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俞价对皇帝也毫不让步。

万历帝朱翊钧为了死后能跟生前一样吃喝玩乐，在万寿山上为自己修建了一座陵墓叫定陵，耗银800万两。国库耗尽，他就派太监到处搜刮，强占农民的土地，把全国的矿藏全部占下，不许百姓开采。朱翊钧的举动，激起了大多朝臣的反对。

皇后勤“喜”，一王姓妃子和一郑姓妃子各生下一子，分别为朱常洛和朱常洵。万历18年(1590)，应该立太子了，大臣们根据祖传法则，既然皇后无出，现有的两皇子都是庶出，那就应册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可是因皇帝宠爱郑嫔妃，爱屋及乌，非要立朱常洵为太子，这就是著名的“国本之争”。双方争执不下，朱翊钧赌气与大臣消极对抗，此后30多年不上朝，直到万历29年冬，皇帝将近40岁了，终于同意册立长子常洛为皇太子，“国本之争”才算告一段落。

对于这两件事，俞价认为关系国运社稷，让步不得。他不惧冒犯皇上，连续不断地给皇上上疏，力陈开矿之弊，请皇上为民生计罢停开矿；为社稷，请皇上严守祖制早立太子。朱翊钧把俞价和其他大臣的奏章全部留中作废。

后来民怨沸腾，全国发生多起农民造反事件，俞价等人轮番上疏，苦口婆心地劝皇上：“皇上深居内宫不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沉之忧。”甚至警告朱翊钧：“皇上，一旦众叛土崩，小民皆为敌国，即使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但是朱翊钧已经尝到了搜刮的甜头，哪里肯听。

俞价他们反复上疏，终于惹恼了朱翊钧。万历23年(1595)冬天，皇帝借兵部查出有副千户者擅自加封为四品官职(副千户应是从五品)，指责部臣徇私，兵科不检举揭发，将大批相关人员降级撤职。同时借机将御史俞价等3人连降3级。一时严旨频下，举朝震骇，但大家都明白，此事与御史无干，这分明是朱翊钧借机打击言官(“帝欲寻端罪言官”)而已。

万历35年(1607)，皇上重新起用了俞价，将他调到远离朝廷的河南巩县任县令。俞价名气很大，一到巩县便名声大噪(至则煌赫之声播于中州)。为防止他再次上疏聒噪，第二年(1608)又以升职为由，调他为南京户部员外郎(员外郎为从五品)。南京是明朝的留都，官员都是闲职，掀不起大的风浪。好在南京管辖的杭州有个北新关，是明代税赋机构所在地，税赋地位十分重要。俞价得到北新关整顿税赋市场，只用半年时间就取得成功，市场井然有序，面貌焕然一新。其不顾当地官员一再挽留，即刻回到南京。庚戌(1610年)又升任南京兵部车驾郎(正五品，主管仪仗、禁卫、驿传等)。俞价官越做越大，管的事情却越来越小。

此时，朝中因皇帝不上朝无法工作，自行离职的官员越来越多，京城的正直官员几次建议召俞价回京“调羹补苴”(补救规谏皇上过失)，而那些佞臣显贵，唯恐俞价回到京城惹事，千方百计谗害构陷他。俞价眼见朝廷纲



常国纪废弛，君臣关系不睦，奸邪党人滋生蔓延，自己即便回朝也难有用武之地，若留在南京也无所事事，无奈，“拂衣去”，弃官而归。

俞价回乡后，为家乡做了很多事情。每遇饥关一州利弊的大事，常据理与刺史(知州)侃侃而谈，“刺史无不唯唯”。乡亲们对俞价愈发尊崇，“皆以包拯目之，谓之包青天”。俞价卒后州民在县署前立俞价进士坊，在州城东门大街立御史俞价殿中執法坊。《牟平县志·民国版》云：“州民传说俞价为本城城隍，故城隍庙香火之盛，为全州之首”。

还有一位先贤王日新，字緝甫，城西门里人。明万历年间，由贡生升授马邑(在今山西朔县境)县令，河间粮马通判，山西大同府中路、南路通判。王日新是位忧国奉公清正廉洁的能吏。

王日新万历丙戌(1586年)任取马邑县。其轻徭薄税，兴利除弊；劝农以兴民业，省刑以厚民俗；建义冢，使贫民有墓葬之地，令枯骨蒙恩；建学田，师生受惠；建义校，培养本地士子。马邑县此前120余年无一入科第，自其上任5年，科第连中30余人，其中不乏进士举人。

王日新恪守名节，一身正气，任职大同府南路督粮通判时，有守备郝木钻升职，特送上当地土产黄鼠一笼，内藏白银五百两，以示答谢。日新只接手木，笼鼠当堂退回。万历26年(1598)，日新奉命携带数十万两银子去江南置办花红，不顾市霸项忠依靠抚院父亲之势威逼强卖，在集市上买到了物美价廉、品质上乘的货物，节银2万余两。万历29年(1601)，因水旱灾交替，蔚州、浑源一带秋作物绝产，饥民遍地，农民发生暴乱。王日新置布袋14000条，以奇谋过紫荆关，于易州等处果得粮食，兼行赈恤灾民，军民欢声雷动。

大同中路为兵马要冲，兼之宗室杂沓，俗称“烦剧”。王日新身兼数职，科理荒政，敝精竭神，积劳成疾，不得不要求退休。其11年职务3迁，所到之处，皆德声满满。回归之日，老幼遮道，军民环泣不得行，只得乘夜离去。

王日新对家人和子女严格要求。每寄家书，只有一二两银供家用，告诉二子，发奋读书才是正路。其为官近20年，家中未增加半亩田地。归家后见家乡因灾歉收，还抱病召集族上富裕户20余家，捐资集义田，以备荒年赈灾之需。

王日新归家不足百日，于万历壬寅(1602年)8月6日离世，享年54岁。王日新一生清正勤勉，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史称其具：“忧国奉公，尤耿耿如青天白日。”去世时，士民无不号泣，四方吊者络绎不绝。

宁海州乡贤祠祭祀的清代四人中，杨维乔是有名的循吏。杨维乔，字岱松，冶头村(现属莱山区解甲庄镇)人，顺治己亥(1659年)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广西浙江道监察御史、河东巡漕(盐的别名)使、口北(河北宣化)道监察御史，山西布政使参议。

杨维乔一生清廉勤政。任监察御史时，革时弊，平市价，抑豪强，兴利举废，吏胥无不敬畏。在北口道，遇灾荒年，民不聊生，冒着“擅动国库”的罪名，先开仓赈粮，后奏闻朝廷。此举冀北百姓赖以存活者无数。

他崇拜刘宪，以刘宪为楷模。他在《和龔公东牟怀古原韵》中写道：“风流卓绝谁能嗣，愿学为官不要钱。”他在河东巡查盐税时，不少盐商以金钱诱之，他都慨然答道：“我生平

淡于荣利，金钱岂能坏我操守！”他对于官员卖官鬻爵、侵占贪占、收受贿赂者决不徇情，俱指实纠参，大官权贵们都惧怕他。在冀北赈灾之时，有个京中权贵，派家人趁山西大同闹灾荒的机会，购买妇女，准备贩卖。当越境宣城时，杨维乔将所贩人口全部扣留，交由地方设法抚养，秋收后，又将她们送回原籍。此事得罪了京中权贵。顺治末年，清政府制造了一起震惊朝野的奏销(清制，各省每年将钱粮征收解拨的实数报部奏闻)案，名义为追索拖欠钱粮，实际是借机打压江南反清的达官士人。江苏巡抚韩世奇亲自部署实施，以文数著称的江南士子，功名尽黜，斯文丧尽，受到沉重打击。康熙8年(1669)，御史杨维乔、李棠、傅感丁等轮番上疏，交章弹劾韩世奇，最终将韩世奇部议削级。这一次朝中权贵相互勾结，借机新账老账一起算，杨维乔被逮赴都，诬陷下狱，判刑十载。

杨维乔押解京城之日，口北百姓如失慈母，数千人呼号相随。其入狱后，口北百姓为其立生祠，四时祭祀，敬之如神。宣城的老百姓都说“我们这辈子一日也不能忘记杨公的恩德啊”。当他们听说杨维乔出狱后隐居在海滨，穿草衣，种田地，还经常以君恩未报而自责，纷纷落泪。

杨维乔出狱后回到家乡冶头村，在村西石桥头筑馆读书，凿地种莲，召集族中子弟，教之读书。20余年不谈朝事，悠然自得，安度晚年。

祀于忠孝祠的先贤

忠孝祠建在名宦祠东侧，有6间大房，祀入“忠义”者11人，都是明代人物。除黄柱、张国儒2人外，其余9人董国柱、王倬、王櫜、官应蛟、官若峒、贺绳前、贺永令、王镐、王青，都是在崇祯16年(1643，癸未年)2月22日癸未之乱中殉难的烈士。祀入“孝悌”者是明清的9位孝子。

黄柱，号穀斋。10岁父歿，事母尽孝，长成，好读书，倾慕岳飞，遂刺“忠君孝亲”4字于背上以自励。正德庚辰(1521年)中武进士，世袭宁海卫百户，升副千户，先后任文登、登州、即墨三营把总，提督莱州府团练，累立战功。几次被荐升迁，然其人品正直，守正不阿，不合潮流，竟忧都去世。州民皆为之惋惜。南京兵部尚书福山人郭康介为其作墓志铭，州民在城内为其立武进士坊。

张国儒，字虹桥，号翰清，新添堡村(现属莱山区)人，万历戊午(1618)解元(科举乡试第一名)。先世自洪武初从戎有功，世袭宁海卫指挥，承袭宁海卫所镇抚，任抚标千总。明天启间，山东白莲教起事，其领兵参与征讨，陷敌包围被俘，面对劝降和酷刑，愤骂不屈，终被残害。

其余9位在“癸未之乱”中牺牲的烈士，笔者在本报2022年3月1日《宁海州癸未之乱》一文中已专门记述，此文不再重复。

祀入忠孝祠的孝子有9人，其中明代6人，为姜瑜、卜怀、于乾、傅大亨、曲谐、王棟；清代3人，为曲復一、苏欲初、苏建乾。9位孝子每人都有一段孝行故事，其中最为感人的当属卜怀和先后祀入忠孝祠的曲谐、曲復一爷孙的孝行。

卜怀，字思敬，弘治丙辰(1496年)贡生，任郅阳府通判(府的副职)。卜怀早年丧父，由母亲郑氏教其识字读书。

母亲对卜怀要求极严，家中备有一根专用的木杖，只要卜怀读书时稍一分心，便用此杖施以惩戒。卜怀少小贪玩，没少受皮肉之苦。但是，孩儿是母亲的心头肉，每次惩戒完毕，母亲都会搂过孩儿，相偎流泪。后来卜怀学业突进，考取贡生。母亲去世时，其正在京城读书，听到噩耗，当即昏死过去，幸学友搀扶，未曾摔倒。苏醒后三日未曾进食，遂兼程奔丧。归家殡葬了母亲后，日日对着那根木杖啼哭，反复念叨“再想要母亲打我，也得不到了”，遂作《哭杖》诗一首：“杖儿儿痛有已时，不杖儿悲悲不止。尚思儿泣母亦泣，杖头认取泪斑紫。”后人对于卜怀的《哭杖》诗好评如潮，有人拿它比《诗经》中的“蓼莪”(篇名，为孝子哀痛不得终养父母的辞)。

后来卜怀在父母的坟墓旁边搭盖了一座小屋，在里面居住了三年，守护坟墓。服丧期间，其日日挖土筑坟。一日，挖土之处忽有清泉涌出，泉水中游有两条红色鲤鱼，长约七八寸，远近的百姓纷纷前来观看，都感到奇怪，认为是卜怀的孝心所感。卜怀后来做了郅阳通判，郅阳人感念他的孝心，找人把他的事迹绘成图画，装订成册，名《孝感图》。一时达官贵人、文人墨客竞相题跋，民间传阅甚广。卜怀任满解绶回归时，到郊外迎接他的大多是他不认识的人，当时人们羡慕他的为人达到如此地步。明隆庆年间朝廷为卜怀旌表建坊，孝子坊建在城南门外。

曲谐和孙儿曲復一，因孝道先后祀入忠孝祠的故事，民国版《牟平县志》有详细记载。

曲谐，字相如，自号大风猛士，明廩生。其性颖悟，貌伟岸，倜傥有奇气，读书过目成诵，浏览他人架上书，如镌刻至肌肤骨髓，人称书橱。他一年四季书卷不释手，人称书痴。他擅长诗文，多有血性之语，雄辩高论，汨汨如泉涌。其虽性格粗犷，侍奉母亲却心细如发，在母亲面前诺诺如孝女。明末兵荒，家里生活艰辛，外面兵荒马乱，母亲又病卧在床，处境非常艰难，其往往悲歌叹息，激而成吟，但始终不离母亲左右。后母亲病逝，居丧期间，其精神萎靡，茶饭不思，瘦得只剩下骨架了。家人邻居劝其饮食，他回答说：“饮食没有味道啊。”清初，州府推举其为孝廉，坚辞不受，以秀才终老。

曲谐的孝行家风传至孙辈，又出了个颇有名声的孝子曲復一。

曲復一，字松庵，康熙庚子(1720年)科举人，国子监学正。曲復一十岁时生母去世，他侍继母以孝闻名。戊寅年(1698)，他正赴郡考试，听到父亲溺水身亡的消息，痛哭哀号奔丧，数日内滴水不入口。父亲下葬后，其在墓旁筑屋守丧四年。一夜刚入睡，忽闻屋外人声鼎沸，打开门，见一村落起火，火焰冲天，众人都不敢向前，其急起前往扑救，火焰一会儿就熄灭了。众人都说是他这个孝子感动了神来帮忙的。

当时州同龔大良对他大加赞赏，约请附近村的秀才在墓旁增建草舍三间，题其匾额“人伦楷模”，办公之余常来抚慰，并说：“以后这个屋不要毁坏，用来表彰孝子。”督学顾公与抚宪蒋公会奏朝廷，奉旨表彰。州牧陈一朋倡倡导为曲復一建石坊，曲復一制止说：“当年奉养父母时，连粗茶淡饭都吃不了，现在怎么能忍心大张其事地自我炫耀呢！”婉拒了。于是，陈一朋于道旁立石碑彰显。陈一朋离任后，江苏盐城人成永健接任知州，又立木主表彰。

烟台螳螂拳期待更多拳种加入非遗大家庭

YMG全媒体记者 刘晋

螳螂拳，是中国传统武术的一大瑰宝、山东四大名拳之一，也是全国十大流派中唯一发源于烟台的拳种。作为烟台地区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的优秀拳种，螳螂拳蜚声海内外。

但相比烟台剪纸、胶东花饽饽等非遗项目的红火发展，螳螂拳略显寂寥。作为历史悠久的拳种，螳螂拳期待有更多拳种加入非遗大家庭。

传承三百余年的螳螂拳法 集十八家手法于一体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螳螂拳，为明末清初胶东人王朗所创。其观察螳螂捕蝉之动静，取其神态，赋其阴阳、刚柔、虚实之理，施以上下、左右、前后、进退之法，演古传十八家手法于一体而创螳螂拳法。

王朗之后，螳螂拳主要在莱阳一带传承。有史可查、有谱可考的首位传人，是莱阳小赤山人李秉霄，有《大盗某志》记载：“先是小赤山人李秉霄，乾隆时随父宦游南河，有一盗某甲，于狱中得危疾，已昏不知人，典狱以告官，命出。秉霄通医理，过试

其脉，买药饮之。盗汗出而苏，夜半伺隙潜遁。越数月，秉霄深夜独坐，盗突至叩谢，秉霄与语，欢甚。盗以艺授之，秉霄亦英敏，艺成而盗不复至……”

《螳螂拳谱十八家拳祖姓名》中提到“王朗的螳螂总敌”，也就是说在道光年间，人们所知道的螳螂门祖师是王朗。螳螂拳在三百多年的发展进程中，以十八家古传拳术宗法为素材，取螳螂搏斗之意，融为一体，使拳法别具特色，形成了规模较大的螳螂拳系统。

1983年，在国家体委进行的“全国武术遗产抢救、挖掘、整理”工作中，莱阳民间拳师刘希云把祖传的“螳螂拳谱”献给国家，并获“雄狮奖”。同时，“三山”之一的王玉山之子王元亮被确定为嫡派螳螂拳传人，并在莱阳收徒授拳。在此契机下，莱阳的武术运动盛行一时。

烟台螳螂拳 已成为中国古代武术文化的重要载体

清末民初，姜化龙、宋子德、李坤山、王玉山、崔寿山先后

到烟台、青岛传授嫡派螳螂拳，由于习练者众多，逐渐形成了现今烟台螳螂门的三枝四派，分别是：莱阳三山一脉的太极螳螂，烟台郝家的太极梅花螳螂，烟台林景山一系的七星螳螂，龙口、招远林世春一脉的六合螳螂等。

1983年，国家第一次传统武术挖掘认定的129个拳种里，螳螂拳被列为“十大拳种”之一。螳螂拳的组成部分非常丰富，它提炼了各家拳法之精华，最大的特点便是实用、拳速快、杀伤力强。也正是因为螳螂拳的这些特性，全国各地乃至世界许多国家都有流传。

烟台螳螂拳 期待更多拳种申遗成功

一代又一代的螳螂拳传人，用毕生心血护卫着这一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果，让其成为全球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它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文化资源。经过三百多年的传承和发展，烟台螳螂拳开枝散叶，已形成十几个流派和拳种，如秘门螳螂、梅花螳螂、六合螳螂、七星螳螂、太极

螳螂、摔手螳螂等，但在扩大影响和争取国家政策支持及后续发展方面明显滞后。虽然螳螂拳早在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增项目中，但没有形成横向的保护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立项后也未能发挥其潜在的价值和功能。在扩展项目申报上，多年来只有栖霞小架螳螂一家获批，可以说，在螳螂拳国家非遗扩展项目申报方面，烟台还大有可为。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栖霞小架螳螂拳和青岛的鸳鸯螳螂拳都是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申遗成功的，而这是完全可以借鉴、复制到其他拳种的优秀经验。申报成功后，可享受与其他非遗项目同等的待遇，比如入选省级、国家级的非遗项目，可享受专项保护经费等。

文化風景